

有所得

为中国精神开窟造像



木兰

敦煌被誉为“中国佛龕”。叶舟创作的长篇小说《敦煌本纪》，实质上是用笔墨开窟。叶舟用他常年驻扎、行走大西北的真实生命，用他多年来对敦煌、对边疆文化的切身体会，融合、创作、升华——他是在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上，开一座让世界人感应、让人心感化的佛窟。

在《敦煌本纪》中有两个核心概念非常突出：一是“开路”。“河西锈带”苦国家苦百姓久矣。路不通，资源无法流通，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锈死、被废弃。而一个个“锈节”也成了地方势力分割盘踞的原因。承担“锈带”恶果的，只能是河西走廊一带的百姓。因此，一批以胡梵义为代表的敦煌少年，联合击力量，成立急进社——用青春和热血、勇敢与担当开路。路通了，长风浩荡，清静光明。这是敦煌少年的事业，也是《敦煌本纪》的气象。

二是“守路”。河西走廊一带，地方势力盘踞，鸦片种植和贸易盛行。敦煌少年，用自己的血性和对“精良纯明”的君子风格的追求，敬畏上天，供养着心中那座精神佛龕。他们用十几年默默的周旋与努力，守住了莫高窟的敦煌宝藏不再流失，他们用血性和牺牲隔断了鸦片贸易这恶之流通。合上书，英雄少年胡梵义那正大光明的话语依然响在耳边，掷地有声：“迄今为止，梵义没有放走过一枝罂粟，也不曾让一两鸦片流出敦煌，我要让他们全部捂在这个口袋里，沤烂、变质，彻底断了那些人的邪念和财路。”

与胡梵义的开路和担当相对的，是另一位主要人物索敞的选择。这个名字本身就很有意思：“索”与“敞”的组合，似乎注定了这个人物的复杂与纠结。索敞继承了索门世代义举的家族荣誉，这让他一生都忧心忡忡，生怕在社会变革中会有责任找上门——他自私、怕事、无担当。他惦记着家族荣誉，要在敦煌将其发扬光大，却拿不出与想要的名声匹配的实际作为。因此，他用尽心思，不惜牺牲家人的幸福，来成全自己的高大形象；他虚荣做戏，制造各种神奇传言，利用种种宣扬渠道，希望能为自己和家族博得口碑。

曾国藩说过，“无实而享大名者，必居奇祸”。索敞为自己的虚伪和贪婪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封闭，逃避，遁世，消极。没有引领人心的精神佛龕在心，没有担当历史使命的责任在肩——这是索敞的心之病，也是那个时代的国之病。在饱尝自己种下的恶果、在经历亲人背叛和炼狱般的囚禁苦刑之后，他终于实现了辽阔的精神抵达。这是痛苦的领悟，也是震撼人心的启示。

叶舟曾说，“敦煌是我诗歌的版图，是我的文字安身立命的疆土，也是我个人一命所悬的天空。”与叶舟聊天，能深深感受到他对敦煌的热爱。他已经用笔写了30年的敦煌。他的诗歌、散文、小说几乎都扎根在那片土地上。2000年大年初一，他独自一人流连于莫高窟的千佛灵岩下。那一天，他像自己书中的人物一样，找到了自己的使命。他独自发愿，“将来一定要为敦煌写一部长篇小说，用一部长篇小说，去描摹整个敦煌的威严与不朽”。在《敦煌本纪》里，叶舟真实地把自己放进了去，把自己的生命状态放进了去。书中有几处“灵光乍现”的记述，是叶舟自己的亲身经历，像突然撕开故事云层的闪电，在某些刹那，让我们看到了站在云端的作者本人。全书109万字，全程饱满，没有塌陷。动笔之前，他心中已经有了一个敦煌本纪的图谱，一个时空中的巨大沙盘。他用自己的热身子，为敦煌精神打下了一座让人震撼的佛窟。

拿着生命写作，是作家与书写对象的生命双向同构——作家将自己的生命精气注入书中，而书中的内容，千佛灵岩、石窟、神佛、菩萨，也都在时时刻刻滋养着作家的精神和灵魂。纵观叶舟之前的作品，能够确切地发现，有些意象和精神，在他的书写中，是贯穿始终的。这些已经融入作者的热血和生命的文学意象，已经成了他的一部分，并将在以后的写作中，继续血肉交融灵魂互熔地“同构”下去。这是一位作家最珍贵的故事——自己的生命故事。

《敦煌本纪》叶舟 著 译林出版社出版

湘版好书

惟楚有才 鬼匪神灵

朱青生

面对一部湖南籍艺术家的口述美术史，顿时心情与许多意识互相勾连激荡。

在我的心目中，湖南籍艺术家向来是一批非常神秘、充满力量的特殊人才。所谓“惟楚有才”，此言的确。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美术馆就曾举办过一场关于湖南美术的展览，我受邀参加开幕式。自一进入展厅，我的心里就有四个字在轮番跳动、呼之欲出，最后不得不把它们写在展览的留言簿上，这四个字就是：鬼匪神灵。“鬼”绝非鬼气之意，鬼者归也，犹如谭嗣同毅然赴义所表现出的如归之从容，虽死，而彪炳千秋。“匪”绝非匪气之意，匪者乃不同寻常、治乱之才也。正是因为内有超绝之心，外则可驾驭人间，应对得体，方寸万千，犹如曾国藩治军辅国，有超绝之心，却以格度安定天下。“神”绝非神气之意，而是一种将日常的情志提升为神圣的存在的可能，担天下为己任、负身俱往的凛然之态，犹如毛泽东主席的作为及其引发的人民的想象。“灵”绝非飘忽的灵气，而是把不可言说的境界铺陈为跌宕生姿的歌唱和呼啸，当年屈原洞庭看潇湘烟雨，所感所见已经化入文脉，乃最好印证。

湖南的艺术也同样具有这样一种特别的意味。当然，艺术突出的重点在于“神”和“灵”。读此口述，深觉所谓神者，在于此中充满日常状态的叙事时常触及神秘感，通天而高贵；所谓灵者，在于表面朴素，实含机锋。

我受邀为这部《出湖——艺术家的口述》撰写序言，起初还有些错愕。我和湖南籍的当代艺术家虽是联系甚多，尤其是在中央美术学院就读时，一届只有一班，我有一同学易英就是湖南人。但是他们大多是与我在北京相交，只有聚餐时才觉察出他们的籍贯，而他们的艺术和思想完全是中国文明和世界文明遭遇的显现，更何况进入互联网时代，人际的界限不在地域，而在性情、格调与意识形态。

口述美术史是今天我们研究历史的重要方面，也是艺术史的两大大主要方法之一。这两种主要方法，一是口述美术史，被中央美术学院的余丁教授总结为“以中央美院为主的方法”；另一个是档案研究，余丁认为是“以北京大学为主的方法”。我们是“档案学派”的执行人，现在湖南出版如此重要的口述文集，令我作序，我觉得一定深有所指。因此，现将我关于这个问题的想法叙述如下。

首先，我们认为任何事件都有三种提供证据的方法：第一种是由当事人本人做出陈述，这便可看作口述美术史；第二种是找到旁证，包括原作相关资料和原始档案，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笔记、日记、票据、物品等物证，还有人证的证词，即由事件之外的人做出陈述，而如果做出陈述的人与该事件无关（证据无功利），那么他所给出材料的证据价值则更大；第三种是在另外的事实中涉及这个事实的证据，一般需要溯源和考证才能检获。第一种称之为本证；第二种是旁证，包括物证和人证；

湘诗情

春心柔扰多静好

龚军辉

我与张毅龙君结识近二十年了，深感他是个文化浸骨的骚客，也是真率性情之辈。《龙吟》是张毅龙近年诗词创作的精粹选本。单纯从技术角度分析，《龙吟》中的121支曲牌，既有我们熟知的“沁园春”“卜算子”“蝶恋花”等知名曲调，也有我们不大熟悉或少见的“安公子”“八六子”等较生僻的词牌，这既体现了作者对词文学研究的通透、深邃，也表达了其力欲带动并普及这种具应时应景性与抒情表意文学体裁的企图。

从主题意向抒怀来说，作者立意的高远旷达，也是令人赞叹而不能不翘指点头的。其生活图景细绘精描显正能量，譬如描写教师生活的《临江仙·课余》“梅菊绽放相迎客，暖茶炉火当归，梦中甘在粉尘杯”，叙议结合，其恬淡而高尚的品格就跃然纸上。作为文学作品的《龙吟》，在诗词创新表达上也有四点令人瞩目。一是其引俚语入词，让人倍感乡土亲切，如《浣溪



第三种是佐证。北京大学“中国现代艺术档案”在工作中始终坚持采取以上“三证俱全”的方法。

如此，其实任何类型的口述美术史对我们这些从事艺术史专业的研究者而言都属于第一种证据，而这也构成了档案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我们对于口述美术史的材料极为重视，将其视作我们自己工作中的一环。实际上，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在收集各种各样的口述材料，但能够像编者这样集结几代之精英，做出这样一本可读性强、耐人寻味的口述美术史文集，确实是我们已所不能而又求之不得的事情，我们也向我们的同事表示衷心的感谢。

对于艺术家的口述材料，我们会更加注意。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艺术家的行为本身就可能是一种创作，而在某种意义上，创作就带有编造以及有意识地进行修改和虚构的成分。这可能会被看作艺术家的才能和性格充分发挥的意义，也正因此，对这些情况的讨论是最为精彩的部分。这也是为何我们常常会把一部口述历史看作文学作品，一部杰作，一段精彩的人生被人理解后做出的一种诗意的表达，一种精神状态到达一定高度后巅峰性的宣泄和发扬。因此，我们虽然是所谓的“档案学派”的工作者，却对口述史持有充分的信任和同样充分的警惕。

但无论如何，当看到有这样的作品能够出现并有机会出版，我们的心中充满了欣喜，因为一旦一个地域的一组口述材料被并置和结集，互相之间的特殊的意义就显示出来，其中的内在动机、社会思潮、政治条件甚至意识形态背景就具有了历史的意义，这是单独和零星的文献不可能具有的价值，我们除了由此而受教，倍觉庆幸之外，也对访谈作者、出版家的劳动和智慧致以崇高的敬意。

《出湖——艺术家的口述》马建成 编著 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

湘新锐

二湘

我的故乡在湘西南的一个小城，少年的我曾站在街头，发誓要离开它，远远地离开它。后来我就真的离开了它，海角天涯地离开了它。许多年后，我偶然地开始写作，而我的故乡，那个遥远的资水的一隅便无声地在我的文字里一点点升起，带着淡淡的桂花香，一次次成为我故事的背景框。

我学的是计算机，是一名软件工程师，走上文学之路于我而言可说是误入藕花深处。我的感觉是迎头碰上，然后只能闷着头往前走。作为一个40岁以前从未做过文学梦，40岁以后开始动笔写第一篇的人来谈，我不知道这样的力量是来自文学，还是内心一种虚幻的渴求。这样的力量让我关注生活的细微和深澈，也更深入地沉浸于文字和书本之美，又同时被创作的各个瓶颈和挣扎所苦。个中滋味，自不待言。

我那时身边有几位深爱文学的朋友，她们甚至为了文学辞职在家写小说。我和她们一起办了一个微信公号，耳熏目染，我也开始写一些散文、诗歌，然后是小说。我是2015年开始写小说的，那时候就发在微信公号上。2016年我开始在一个微信号上连载我的第一个长篇小说《狂流》，总点击超过百万。

4年的时间，我写了近百万字，出版了两部长篇小说《狂流》《暗涌》，一部中短篇小说集《重返2046》，并在海内外期刊发表中短篇小说20余种。我不觉得是文学爆发，可能就是时机和运气比较好。一是刚开始写小说，处于井喷期，又是人到中年，积累了足够多的阅历，有很多可以写的素材，加上正好是自媒体如火如荼的时候，我的文章发在微信公号上还有不少读者。

我的写作有现实题材和科幻题材两类，一些作品如《费城实验》《马兰花开》《绿色时光》等，在现实题材中插入了奇幻因素。在现实题材里加入科幻的元素是我努力尝试的，因为科幻可以加入一些现实小说里无法实现的设定，在这样一些非常规的设定下，人心和人性往往得到一些极致的袒露。但是这往往需要做得足够融通自然，才能让文本没有突兀和违和的感觉。

我个人浅显的经验是，无论什么题材和类型的写作都有共通之处，优秀的小说无关类别、题材，对作品的深度、广度和创新程度的要求都是一致的。但是具体到写作上，我个人觉得科幻小说更更难写，对作者的想象力、创造力和逻辑的严密程度要求更高。

《狂流》和《暗涌》这两部小说是我的命运三部曲中的前两部，原意是分别从女性和男性的视野来书写这个时代，并聚焦书写70后留学生成长的道路。第三部《长河》还在酝酿中，是打算从男女均匀的视角书写，时间跨度更大，场景也更为宏阔一些。在写《狂流》时，我还没有获得更多写作技巧，基本就是手随心动，更多的是出自本性和本心的写作，没有什么条条框框约束自己，所以也写得很顺畅。到了《暗涌》，阅读的经典和写作技巧方面的文章增多，结构上有了一些闪回、倒叙、反转和伏笔，文字上也更加精细。但是在两部小说里，我都比较注重小说逻辑的严密，我专门有两个朋友帮我审稿把关，看情节是否合理，逻辑是否合理，是否有常识和前后不一致的漏洞。另外我非常看重细节的真实可信，几乎每个细节都求证过，在写《暗涌》时，每一个城市我都找一个朋友把关，看是否把握住这个城市的气息和特色。再有，我很看重小说里对情感的书写，两个小说里我都花了不少笔墨写情感线，并努力写得饱满真实。

《狂流》里的三个女主角从大学开始准备留学到后来去美国留学，几乎就是自己经历的翻版，虽然感情经历和她们迥然不同。很多故事的细节其实就是自己生活的细节，写她们，也是对自己青春和留学生活的回望和打捞。而《暗涌》里，贵林从乡村到城市，从南方到北方，从东方到西方的迁徙路线，也正是我自己所经历的。里面提到的邵阳和大连也是我自己生活过的地方，把自己的经历混杂在这样一幅波澜起伏的时代图卷里，是一种新鲜而有意味的写作经验。

《暗涌》二湘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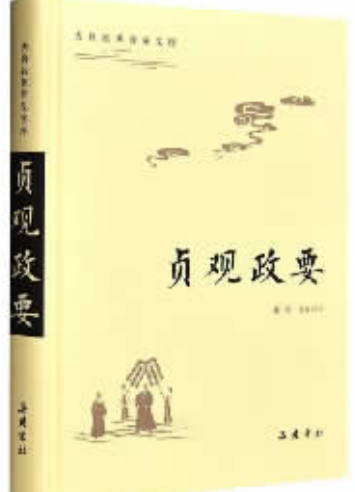
走马观书



《人类的终极问题》

袁越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在古希腊时代，柏拉图提出了“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一哲学的命题。自此，忙碌的人类会时不时地停下脚步，在内心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在本书中，作者运用脑科学、生命科学、基因和生物学知识，书写地球的编年史，解密人类的起源和创造力的源泉，借以回应先哲的追问。



《贞观政要》

滕帅 导读、注译 岳麓书社

《贞观政要》成书于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当时虽处盛唐，但社会危机已渐露端倪。作为一名敏锐且尽责的史官，吴兢感到有必要总结“贞观盛世”君臣相得、励精图治的成功经验，为当时的帝王树立施政典范。贯穿《贞观政要》的核心思想是居安思危，即忧患意识。它是《贞观政要》立书的根本，也是“贞观之治”的密码。